

创造“有声的中国”

——卡莱尔与鲁迅早期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

姜荣刚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鲁迅早期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卡莱尔的文化与文学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卡莱尔对中世纪千年“沉寂(silent)”无声的判断与描述,以及诗人英雄伟大作品洞穿事物本质与根基于真诚“心声”的文学观,成为鲁迅沟通与整合中西文学资源的触媒,并由此形成了他创造“有声的中国”的独特文学革新理想与一生不懈的文学追求。

[关键词]鲁迅;卡莱尔;心声;真诚;文学革新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5)07-0056-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25.07.007

探究、揭示与批判“无声的中国”,创造“有声的中国”,是鲁迅一生不懈的文学追求。这一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与鲁迅留日期间对卡莱尔(Thomas Carlyle)文化与文学思想的接受存在密切关系,但遗憾的是尽管早有学者指出鲁迅《摩罗诗力说》引录了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中的内容^①,但却未见有对此一问题予以专题探讨者,这对于深入认识鲁迅此一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一、“沉寂的中世纪”与“寂寞”的中国

“无声的中国”的发现,是鲁迅创造“有声的中国”的逻辑起点。这种发现尽管与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独到与深刻的理解以及自身的体验存在直接关系,但若无域外文化因素的刺激与触发,恐怕也是很难自发生成的。在这些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卡莱尔的文化思想是最关键性的一个。

在留日期间,鲁迅对卡莱尔相当熟悉,也相当肯定。如其《科学史教篇》中说“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薰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或为克灵威尔,为弥耳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路德、克灵威尔(克伦威尔)、弥耳敦(弥尔顿)、华盛顿等均是西方历史文化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鲁迅将卡莱尔(嘉来勒)与他们并列,视作对社会精神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伟人,足见鲁迅对卡莱尔的肯定程度之高。所以在该文末尾,鲁迅认为科学与精神应相济而行时,又说“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家如嘉来勒”^②。正是因为对卡莱尔的此种肯定,鲁迅才将卡莱尔的文化与文学思想作为自己文学革新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之一。

卡莱尔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这也是鲁迅《摩罗诗力说》直接引用过的著作。卡莱尔在该书“诗人英雄”一讲中论述但丁时,反复提到了中世纪的“沉寂”,如“中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群体文献辑考、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26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粹思潮与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1BZW02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荣刚(1976—),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①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②令飞《科学史教篇》,《河南》第5期,1908年6月5日。

纪沉寂千年”“中世纪千年的沉寂”“中世纪十个世纪的沉寂”等^①，“沉寂”的英文原文即“silent”^②。卡莱尔所说的“沉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没有声音发出，而是指中世纪缺乏透过表象看本质且发自内心的真诚之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如此评价但丁的《神曲》：“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切诗作中最真诚的一部；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真诚是价值尺度。……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强烈的真诚写出来的，真实而又清晰明了。……这是但丁的精心之作，它把中世纪的灵魂有节奏地描绘出来，使之永远清晰可见”，又说“但丁是中世纪的代言人（spokesman：引者注），他把中世纪赖以生存的思想，以永恒的音乐表达出来，既恐怖又优美，是所有他的善良先辈基督徒们深思熟虑的成果。诚然，他们是可贵的，但是，他不也一样可贵吗？如果他们不发言表达思想，许多事情就会长期沉寂；即使没有死去，也活得无声无息”^③。

西方的近代文明肇端于文艺复兴，因此从后来的眼光返观中世纪，自然会认为这是一个宗教束缚与封建压制并存，以致言无自由、人心锢蔽的时代^④。晚清西学东渐，此种历史认知亦为国人所接受，并借以自比，乃至引为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变革的参考与依据。正是在此种历史背景下，鲁迅对卡莱尔所描述的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沉寂”才产生了极强的同感之戚。如其《摩罗诗力说》开头所说“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这种“萧条”在鲁迅看来就是一种无声的“寂寞”，此时“诗人绝迹”，“口舌一结，众语俱沦”^⑤。鲁迅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爱智之士”与西方不同，他们幻想唐虞、古初“万祸不作，人安其天”，非如“斯世之恶浊玷危，无以生活”，既作此念，自然“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非自杀以从古人”，亦必“终其身更无希冀经营”，而终致“神质同隳而已”，或“脱履尘埃”，“身以隐逸终”。再不然，则如枭雄老子之辈，“立言辞，欲致人同归于朴古”，“要在不撓人心”，“以不撓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次，中国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理想亦在“不撓”，为保位与子孙世代为王，对“有人撓人，或有人得撓者”，则必全力禁止，对于天才之出，更是“竭全力死之”。而普通民众，同样为安生起见，所为与帝王一般无二，“有人撓人，或有人得撓者”，则必大禁，“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因此对于天才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不过，尽管朝野上下均认为诗尤其是天才之作为“撓人心”的罪魁祸首，但毕竟无法禁绝，于是便“设范以囚之”，古初的“言志”之说，即被后贤立说改造，将其解释为“持人性情”，诗三百之旨，遂为“无邪所蔽”。如此“许自繇于鞭策羁縻之下”，致使“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所作不是“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便是“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图圈，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唯一的例外是屈原，“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只是可惜的是，对于屈原后来之人，皆着意其外形，不涉猎其内质，致使“伟美之声”，再无“震吾人之耳鼓者”^⑥。

除了封建压制与思想束缚所导致的沉默，鲁迅称之为无声的“寂寞”外，对于那种“举天下无违言”的所谓众声喧哗，他同样认为是一种无声的“寂寞”。如其《破恶声论》中所言“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更有甚者，“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括；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所以，他不仅认为以往中国“寂漠为政”，“而今之中国”，亦“正一寂漠境”^⑦。

直到1927年，鲁迅给香港青年会所做的演讲，仍然以《无声的中国》为题，来表达他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判断与不满。他对中国人无声的“寂寞”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描述与阐释，这种无声的“寂寞”既

①③[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3、104、118页，第110、118-119页。

②[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李兴福导读注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99页。

④吴葆诚编译《东西洋历史教科书》，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05年版，第184页。

⑤⑥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期，1908年2月1日。

⑦迅行《破恶声论》，《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5日。

有因文章难写而无法发声,或即使有发声,“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又或者因讲历史或时事而被杀,导致人们“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所以鲁迅称中国“直到现在”,“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并自问自答道“人会没有声音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①。鲁迅的此种观点与晚清可谓一脉相承,只不过较之前更为突出与系统罢了。当然,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之处,那就是后者增加了书写语言工具的考量,这一点显然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存在直接关系。此种变化使得学界在探讨鲁迅对“声”的持久敏感与不懈追求时,更倾向于从书写语言的角度回溯其产生之根源,从而忽略了这一追求背后更加本质或者说深层次的东西。鲁迅在晚清时期固然也曾参与过白话文学变革,但正如周作人所说,鲁迅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发生,对“改写白话文的问题”都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②。这足以说明鲁迅对“声”的持久敏感与不懈追求始初与书写语言并无直接联系,而是重在思想的自由发声与革命,只不过因“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与方向,才将目标转向书写语言,以其为突破口,重启其旧时的思想革命主张。因此,探讨鲁迅对“声”的持久敏感与不懈追求的深层原因,仍须从其思想革命的主张入手,其“无声的中国”的观念起源恰是这一主张的逻辑起点,由此足见卡莱尔“沉寂的中世纪”对鲁迅启示与影响的意义之重大。

二、“心声”:卡莱尔诗学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早期尤其是 1907 至 1908 年间发表在《河南》杂志的系列论文,不仅奠定了其一生文学观念与追求的基础,而且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③。这一点在后来发生的“五四”文学革命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周作人就说“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④。通过创办杂志以实现自己的思想革命理想虽然因《新生》的流产而破灭,但据周作人说,两年以后“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又都“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⑤。鲁迅在《河南》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尽管如周作人所说体现了他思想革命的主导倾向,但实现的途径毕竟是文学的,这即是其《摩罗诗力说》写作的根本原因。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一个贯通思想启蒙与文学变革的核心概念——“心声”,称“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有但丁发出心声的意大利,虽分崩,“然实一统”,“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⑥。有论者由此认为“心声”是“鲁迅的文化解决方案在精神和美学上的重要投射”^⑦,是十分准确的判断。

正是因为“心声”概念在鲁迅文学思想中的地位显得如此重要,所以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乐黛云认为鲁迅的“心声”源于《庄子·天下》篇的“白心”,所谓“白心”就是庄子所说的“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的至精至诚的心声^⑧。汪卫东则认为“心声”的语源来自中国古语“言为心声”,并称在鲁迅那里,“心声”即“诗歌”不过“‘诗’所‘言’者非来自‘志’”,“而是直接来自原初的‘神思’”^⑨。指出鲁迅所用的“心声”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理清其真实内涵固然颇有助益,但正如有论者所说,二者之间仍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季剑青就指出“心声”一词虽然古已有之,“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不过古汉语“心声”一词侧重于“心”的某种道德状态,“心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

②周作人著,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③参李震《〈摩罗诗力说〉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④周作人《新青年》,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⑤周作人《再是东京》,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7页。

⑥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期,1908年2月1日。

⑦李春《文学翻译与文学革命——早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翻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⑧乐黛云《鲁迅的〈破恶声论〉及其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⑨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另参汪卫东、沈杰《抒发“心声”、沟通痛感与召唤主体——鲁迅文学魅力一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期。

声’是对这种状态的呈现,而鲁迅则特别强调抒发‘心声’的动作性”^①。这一判断当否暂且勿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心声”与中国古代语源并非是完全对等的。

实际上,在探讨“心声”一词的语源时,研究者仅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忽略了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很多传统术语已是中西义涵共具,仅探讨中学之源,显然是不够的。与鲁迅同时的周作人,所著《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也用到了“心声”这一核心概念,并阐释称:

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感现之间,既有以见他缘,亦因可觐自境。英人珂尔堙普(Courthope)曰:“文章之中可见国民之心意,犹史册之记民生也。”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古时纯粹文章,殆惟诗歌。此外皆悬疑间耳。)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②

周作人的这一中西互证的用法应该受到了严复所译《美术通论》的影响,其《艺术》篇有言:“诗歌为物,所与心灵直接者也,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而诗歌所与心灵接者,即以此心声心画为中尘焉,交于神明,此为最利之器矣”^③。“心声”对应的是“idea”,“心画”对应的是“mental pictures”^④,二者的意思基本是一致的。周作人在其文章中使用了严复所译《美术通论·艺术》篇自创的一个新词“托意写诚”,所以他将“心声”放在中西学交汇的历史语境下进行阐释,也必然会受到严复上述翻译的影响。周作人在《河南》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多与鲁迅反复讨论过,所以二者文章无论是在思路材料,还是具体概念与用词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⑤。“心声”的用法与义涵自然也不应有根本性的区别,完全可以拿来作为认识鲁迅“心声”概念的可靠参照。从周作人的观点出发,至少可以肯定鲁迅的“心声”与中国传统诗学“诗言志”及扬雄的观点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仅获得这一认识还是不够的,鲁迅在这一概念中所注入的西学与周作人不同,而这才是鲁迅独特文学观形成的关键。实际上,鲁迅“心声”的主要西学来源学界早已知晓,那就是《摩罗诗力说》引述的卡莱尔的观点,只是可惜的是,论者多据引文泛泛而谈,而未根据卡莱尔的原文进行深入分析,或以为鲁迅吸取的是其“重视甚至夸大文艺的精神教育作用”^⑥,或以为鲁迅有借此进行国语(白话)启蒙的目的^⑦,不仅误解了卡莱尔的观点,也未能抓住鲁迅对其取义的核心与关键。此点不明,鲁迅早期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问题自然也就难以理清。

鲁迅《摩罗诗力说》中引录卡莱尔的话出自《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第三讲“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心声”一词对应的英文原文为“voice”^⑧。在阐释“心声(voice)”一词的内涵之前,必须首先清楚卡莱尔所说的“诗人英雄”指的是什么。卡莱尔认为“英雄”首要乃至全部的特征便是能够“透过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looks through the shows of things into thing)^⑨,诗人和先知相同,都能“深入宇宙的神圣奥秘”——“即歌德所谓的‘公开的秘密’之中”,这个“神圣的奥秘”恰如费希特所说的“存在于现象深处的世界的神圣理念(Divine Idea)”^⑩。诗人就是把他们所受的神启或所“看(see)”到的事物本质——神圣的奥秘,用语言表达出来,“教育人们加深对它的认识”,这即是诗人永恒的使命^⑪。所以,卡莱尔所说的“心声(voice)”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话或发声,而是能洞穿事物奥秘与本质且发自内心的声音。如此一来,这个“心声(voice)”就必然要求它“真诚(sincerity)”,所以“真诚(sincerity)”与“心声(voice)”一样都是该著反复出现且不断被卡莱尔强调的一个词。如《神曲》,卡莱尔认为正是因为但丁内心“深厚的真诚(depth of sincerity)”,才使其创作出了“发自内心的灵魂深处的作

①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②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第4期,1908年5月5日。

③[英]倭斯弗著《美术通论·艺术》,严复译,《寰球中国学生报》第3期,1906年10月。

④W. Basil Worsfold,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Press, 1901, p. 10.

⑤郅元宝《鲁迅六讲》(二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5页。

⑥孙昌熙等著《鲁迅文艺思想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⑦郅元宝《鲁迅看取意大利文化的眼光》,《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1期。

⑧⑨⑩[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李兴福导读注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30页,第65页,第92页。

⑪[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6页。

品”,“道出了人类的心声”。这种“内在东西”的拥有,既是但丁《神曲》区别于他人,同时也是其作品伟大与具有永恒价值的关键所在。相反,那些仅有外表的作品,则会“随着事物瞬息变化而消失”^①,与没有表达的无声无息者并无本质性的差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卡莱尔才称但丁代表着“中世纪沉寂千年的心声”。

事实上,不仅是但丁,在卡莱尔看来,英雄或伟大人物的首要特征即是“真诚”,其创造性的价值也不在于新颖,“而在于真诚”^②。正是这种“真诚”,使原始人走出了蒙昧时代,开始了人文精神的伟大创造。卡莱尔认为:“一切异教的本质在于:把自然力视为神圣的、巨大的和人格化的力量,或是当作神,或是当作魔鬼。……这是一种思想,即深沉、直率和诚挚的心灵的真诚思想,对周围事物完全开放,并对这些事物作直接和真诚的检验,这正是一切时代中一切完美思想的首要特征”^③。他以奥丁为例,称“这位奥丁在其原始的发音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却有话要说。他敞开伟大的胸怀领略这个广阔的世界和人生,并以非凡的言语作了表达。……他在蒙昧时代作出了如此的成果,犹如黑暗中点燃的明灯,是显示原始人崇高心灵和智慧的明灯,也是至今仍照耀我们的唯一明灯”。又说“这就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宗教的最初种子,一切形式的神话、象征性的习俗、思辨、寓言、诗歌和传说都自然地由此生长。……这种愚昧的活力就是全体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急切的、欲说不能的未曾开化的心灵,只是热切渴望能够表达,永远不断地表达!这样,充满生气的教义就开始生长,不断地发展壮大。——就像一棵榕树,第一颗种子是至关重要的”^④。阿拉伯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是这样,他留下的经典《古兰经》首要特征即“在于它的真诚性”,所以虽然它“粗糙、愚昧甚至不堪卒读”,但却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卡莱尔由此认为“如果一本书是出自肺腑,它就会激动人心,一切艺术和写作技巧就显得是次要的”^⑤。反之,如果一本书仅具华丽的外表,“内容却是空空洞洞”,那么“写这种作品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也是“应该加以排斥的人”^⑥。

卡莱尔在评价《古兰经》的优点时,曾说“真诚是这部书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优点,其他优点都由它派生”。这句话拿来作为他文学观的概括,可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那就是文学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优点”即是“真诚”,“其他优点都由它派生”^⑦。应该说,中国传统诗学“诗言志”“言为心声”并非不含有“真诚”之义,但却未像卡莱尔这样予以特别的强调,而这正是鲁迅倡导文学革新所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此才为其所看重,并引以为文学革新的重要外来资源。

三、“有声的中国”:鲁迅的文学革新理想

晚清自甲午战败以后,智识阶层对西方的学习开始从军兵器械之末逐渐转移到政治制度乃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文学也开启了新的变革时代。由于接受的西学不同,也导致晚清时期提出文学变革方案多种多样,一时有令人目不暇给、无所适从之慨。职是之故,辨别这些声音的真伪,破除嘈杂的各种恶声,以确立真正的文学之声,就显得颇为重要,而卡莱尔恰好为鲁迅提供了这样一个参照,也因此为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革新思想奠定了基础。

大概考虑到自己“心声”概念与以往的用法有所不同,鲁迅在早期的文章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反复的阐释与说明,如“内曜者,破黯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心声也,内曜也,不可见也”^⑧。“内曜”指的是人内在的精神灵明,是能洞穿事物本质的精神品质,“心声”便是此种“内曜”的外在表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离伪诈”与“有己”——即“真诚”。与前述卡莱尔的“心声”定义相比照,二者的内涵大体相同。以此为标准,鲁迅对中国传统与当下文学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与分析,他的判断是除上古初民能“道其所道”,创造出“两间之绝唱”^⑨外,中国一直是一个寂寞的无声之国。不过若从表面看,此时的中国不惟不寂寞,甚至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但是鲁迅却认为这不过是“恶浊扰攘”而已,“视寂寞且愈甚”,也就说仍然是“一寂漠境”。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本根剥丧”,二是“进毒操刀”。所谓“本根剥丧”是指对中国尚有生命力文化的攻伐与破坏。

①②③④⑤⑥⑦[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9页,第151页,第21-22页,第33-39页,第78页,第216页,第80页。

⑧迅行《破恶声论》,《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5日。

⑨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期,1908年2月1日。

鲁迅以当时“破迷信”运动为例,志士视为“迷信”的东西,鲁迅则认为“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这种观点与卡莱尔完全一致,对于神话、宗教的产生,卡莱尔认为尽管它本身是愚昧的,但这愚昧却孕育着生命的活力,一切形式的人文创造皆是由此自然生长起来的。这样,“迷信”一旦破除,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中华文化之根也就随之被彻底斩断,必然使人“元气黷浊,性如沉湮,灵明已亏,沦溺嗜欲”,更加丧失向上的动力。也正因此,鲁迅认为当下之急务是“伪士可去”,而“迷信当存”。既然“内曜”也即人内在的灵明是一切思想学术创造的根源,那就应该着力加以保护与培育,从域外采掇文化,也应启发国人内在的灵明为首务,然而当下中国志士英雄倡导的各种革新方案,无不集中于“物质”与“众数”,“物质”即“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等求富求强之诸种主张,“众数”则是灭裂个人的“国民”与“世界人”等主张,这些对于缺乏乃至已丧失内在灵明的国人来说,的确是“进毒操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志士英雄的言论主张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之声,而是“为饮啖计”,“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蒙帷幕而不能白心”,所以他们造就的只是一个看起来扰攘喧哗,实则更加“寂漠而无声”的中国^①。

既然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处在寂寞无声的世界,那么解决的办法首先必须打破这种寂寞,做一个“攫人心”之人,鲁迅因此说“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黷暗者也;心声者,离诈伪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望虽小陋,顾亦留独弦于槁梧,仰孤星于秋昊也”^②。这与卡莱尔描述的诗人或文人英雄一样,都是用自己的真诚心声唤醒大众的内在灵明,从而振起他们向上的动力。考虑到中国一向有崇尚平和也即“不攫人心”的传统,鲁迅引进的域外新声,以“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为主,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③,可见真诚亦是此派最为显著的特征。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民心声才会因为相应的域外新声之输入,得以激发复苏,焕发出新的活力,二者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所谓“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④。对于这个“新宗”,鲁迅描述称“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总之,就是期望能由此能造就出“至诚之声”的精神界战士,以藉此破除中国荒寒、萧条的现状^⑤。这即是其早期文学革新的命意与路径之所在。很显然,中国上古时期的“诗言志”观与卡莱尔文学观中的真诚心声构成了这一文学革新思想最为关键的内核。

另需说明的是,不少论者认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引述但丁有借此进行国语(白话)启蒙的意图,并与此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而引但丁使用俚语为证予以同等看待,这显然是未予深究的误解。首先,鲁迅引证的出处完全没有这种意思,卡莱尔的观点甚至还与此相反。他在评价但丁的价值时,曾将其与先知英雄穆罕默德进行了对比,然后说:

恐怕他的作用并不低于穆罕默德,相反,却超过了他。穆罕默德面向人民大众,他用的言论是他们能够接受的粗俗的方言:这种方言充满着自相矛盾、粗鲁言语和蠢话,只对普通群众起作用,而且还奇特地把善与恶混为一体。但丁的言论,不论何时何地都是面向高贵、纯洁和伟大人物的,他的言论不会像其他事物一样会过时。但丁像闪烁在太空的一颗晶莹的明星,照耀着各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和高贵者,他永远是世界上所有上帝的选民们的财富。人们可以预料,但丁的影响要比穆罕默德更为长久。^⑥

卡莱尔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但丁的语言是“面向高贵、纯洁和伟大人物的”,与穆罕默德面向“普通群众”的“粗俗的方言”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比后者更具有永恒的价值与影响。其次,晚清时期国人提及

①②迅行《破恶声论》,《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5日。

③⑤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第2期,1908年2月1日。

④迅行《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期,1908年8月5日。

⑥[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0-121页。

但丁,也从未觉得他的作品使用的是白话俚语,反而与卡莱尔的认识比较接近,即是一种典雅的文言^①。再者,诚如前文引述周作人所说的那样,鲁迅在办《新生》的时候,对思想革命看得极重,而“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却无甚兴趣。所以,鲁迅创办《新生》时期的文学革新,其重心显然在提倡冲破无边寂寞的真诚的文学“心声”,而非普及性的大众启蒙,他此时采用的文学语言还处在模仿章太炎、刘师培古奥文风的阶段,更足以说明这一点。

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清末最后几年因为形势的巨变,“殊异之思,淑诡之物,渐渐入中国,志士多危心,亦相率赴欧墨,欲采掇其文化,而纳之宗邦。凡所浴颢气则新绝,凡所遇思潮则新绝,顾环流其营卫者,则依然炎黄之血也。荣华在中,厄于肃杀,婴以外物,勃焉怒生。于是苏古掇新,精神闾彻,自既大自我于无竟,又复时返顾其旧乡,披厥心而成声,殷若雷霆之起物。梦者自梦,觉者是之,则中国之人,庶赖此数硕士而不殄灭,国人之存者一,中国斯侏生于是已。虽然,日月逝矣,而寂漠犹未央也。上下求索,阒其无人,不发自中,不见应外,颢蒙默止,若存若亡,意者往之见戕贼者深,因将长槁枯而不复苑与,此则可为坠心陨涕者也”^②。应该说,鲁迅自己也可算作其所说的“此数硕士”中的人物,他此时创办的《新生》杂志,正是希望通过“披厥心而成声”,以达到“殷若雷霆之起物”的功效,但可惜的是《新生》还没出世即因资本短缺而流产。不过《新生》虽然失败了,但鲁迅对有声中国的渴求与信念却并未因此发生丝毫动摇,而是沉入心底,成了他一生永恒的文学追求。

对于《新生》杂志的失败,鲁迅事后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态:“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③。这与前引《破恶声论》所描述的“数硕士”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毫无疑问,这更加深了鲁迅对无声中国及其冷落寂寞的感受,也使他陷入了很长时间的沉寂期。直到“五四”文学革命爆发,钱玄同出面请他为《新青年》撰稿,才再度将其潜藏心底的文学之梦唤醒。鲁迅意识到《新青年》可能遇到了与他当年创办《新生》杂志同样的问题,即“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反对”^④,自然也会感到与他一样的寂寞。由于有以往《新生》失败的经验,所以他对《新青年》并不抱多大希望,他因而举了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不过,鲁迅仍与晚清一样,虽然对当下失望,却“未绝大冀于方来”,还是答应为《新青年》撰稿,并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⑤。汪晖说鲁迅的“呐喊”是对“寂寞”的反抗^⑥,从表面来看固然如此,不过就内里而言毋宁说他是对于无声中国的反抗更为恰当。

鲁迅不光以自己的文艺之笔实践着他那冲破寂寞与创造有声中国的文学理想,同时还号召青年也一起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1927 年他在香港青年会所作的《无声的中国》演讲中就说: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在该文的末尾,鲁迅又这样反问道:“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在?”^⑦这与鲁迅《摩罗诗力说》引录卡莱尔的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以自己真诚的心声创造有声的中国是鲁迅自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文学梦想,这个梦想既是对中国古民心声的继承,也是卡莱尔文化与文学思想沟通触发的结果。

[责任编辑:曹振华]

①姜荣刚《从晚清到“五四”:暧昧的文艺复兴与错位的文学变革》,《文艺研究》2023 年第 5 期。

②迅行《破恶声论》,《河南》第 8 期,1908 年 12 月 5 日。

③④⑤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9 页,第 441 页,第 441 页。

⑥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9 页。

⑦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Main Abstracts

The emergence context and shaping path of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un Linqiong 5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generated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Marxist cultural view, and emerges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nal need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t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upholds integrity and innovates, breeding content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to continue to build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ighlight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he people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cultural form construction syste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cultural form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openness, and realize the coupling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wisdom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system.

Concentration of powers: the stability of the propaganda work system of the CP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en Long 21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response to the propaganda offensive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Kuomintang, the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PC spread out in a wide range. Based on Mao Zedong's experience as acting as the Minister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Kuomintang and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the system was initially centralized on a democratic basi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ordinate committees" to promote work. Later, it was upgraded to the Central Propaganda Committee to manage propaganda and agit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newspapers and communications and adopted a "unified" leadership with "division of labor and unity". It clarified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same level party committee deciding major issues and the independent operation of the propaganda department according to the superior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state, practiced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facts and integrating words and deeds, and ultimately won an advantage in the propaganda war.

On the earliest enlistment poem in ancient China

—A new study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Wu Yi" from Qin Feng in *The Book of Songs*

Zheng Qianru Yang Qingcun 41

The poem "Wu Yi" ("No Clothes") from Qin Feng in *The Book of Songs* was recognized as the earliest enlistment poetry in ancient China. Scholars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primarily adopted the theory of "satirizing militarism" in Mao's *Shi Xiao Xu* (Minor Preface) to interpret the poem's intent. In the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pioneered the pursuit of the poem's "primary intent" in hi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Poetry*. Scholars such as Su Shi, Wang Anshi, Huang Tingjian, Lv Zuqian, and Zhu Xi further contributed diverse perspectives, yet none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ed or precisely defined its essence, leav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bscured. The key to reveal the poem's "original meaning" lies in a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yered significance embedded in "Wu Yi". In ancient China, clothing was a vital aspect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serving as a visible marker of social identity—"clothing must not be worn by those unqualified". The poet artfully employed the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distinctions of "clothing" to depict the protagonist's joy in exchanging civilian attire for military uniform upon enlistment and the heroic resolve to march to the battlefield. This positions the poem a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work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to focus on military enlistment, exerting a profound and indelible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of martial poetry that extol patriotic devotion.

Creating a "China with voice"

—The formation of Lu Xun's early literary innovation thought

Jiang Ronggang 56

The formation of Lu Xun's early literary innovation ideas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Carlyle's cultural and literary thought. Carlyle's judgment and description of the millennium of "silence" in the Middle Ages,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view of poets and heroic works that penetrate the essence of things and are based on sincere “voices”, became a catalyst for Lu Xun to communicate and integrate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resources, and thus formed his unique literary innovation ideal of creating a “China with voice” and his lifelong relentless literary pursuit.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based on PMC index model

Yang Lin Cui Yuhu 98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is a technical suppor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trengthening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h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marin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y constructing a text database of regional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ypical regional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PMC index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existing policies generally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rehensive coastal zone management. However,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among coastal regions, there is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PMC index of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Some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fac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limited incentive tools, poor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inadequat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enriching policy incentive tools, optimizing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management system have become objective choices for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coastal zon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policies.

Chinese modern history journals and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Shu Xilong 130

It is in th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historical knowledge that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onstructed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introducing the Western method of dividing history into different disciplines, breaking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knowledg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 an inevitable historical tren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and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journals has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Chinese history. Modern history journals have been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ace” of modern history, greatl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towards refinement,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achievement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nd new historical methods have accelera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y, promoting the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orld historiography. Chinese modern history journals have established an academic stage for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n modern history research, as well as evalu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losed academic research. They gathered strength for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odern historical research teams through the link of journals, formed a “public space”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through academic evaluation and dialogue, established a normative and universal historical order, and stimulated scholars’ creativity in academic research.

The reform approach, implementation logic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s government services

Zhu Jingyan 175

The term “government services” not only includes practical regulations on the supply subject, matter content, and supply objects, but also reflects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PC’s wholehearted service to the people. In the past period,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services was embedded in the whole chain of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aking “Internet + government services” as the main line, and focusing on various key work, it has steadily progressed, which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masses of enterprises to handle affairs and improved the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straightening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productivity base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services should continue to focus on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standardization, norm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epening the supply of reform to enhance the sense of gain for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